

郝正春 著

以山西寿阳县  
之例，探寻新中国成立  
初期农村  
党组织之貌

# 扎

中国一个县域的党组织建设考察

ZHONGGUO YIGE XIANYU DE DANGZUZHI JIANSHE KAOCHA

1949—1956

# 根

一个县域  
乃至一个村庄里  
可能就藏着一个  
“中国”


小视域  
中的  
大世界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农村的党员与党组织研究(1949—1956)》(项目编号:17YJA770007)资助

郝正春 ○ 著



# 扎

中国一个县域的党组织建设考察

ZHONGGUO YIGE XIANYU DE DANGZUZHJ JIANSHE KAOCHA

1949—1956



# 根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扎根：中国一个县域的党组织建设考察：1949—1956 / 郝正春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12  
ISBN 978-7-214-28324-5

I. ①扎… II. ①郝… III. 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7.2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72564 号

书 名 扎根：中国一个县域的党组织建设考察(1949—1956)  
著 者 郝正春  
责任编辑 陈 颖  
特约编辑 王暮涵  
装帧设计 赵春明  
责任监制 王 娟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页2  
字 数 207千字  
版 次 202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3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8324-5  
定 价 7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绪 论 1

- 一、探究累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研究 3
- 二、宏微互洽：中共组织史研究的一种实践趋向 9
- 三、设身处地：中共组织史研究之资料收集与方法融合 18
- 四、谋篇布局：本研究的研究理路与叙述架构 24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寿阳县农村的社会生态和组织形态 27

- 一、农村党组织发展的社会生态 27
- 二、党组织发展轨迹及基本形态 32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组织建设的社会生态 56

- 一、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建立 57
- 二、农村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 62
- 三、农村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困境 64
- 四、农村党组织建设的顶层规划 68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组织的吸纳实践	86
一、	农村党员吸纳的地方规划	87
二、	农村党员吸纳的具体举措	96
三、	农村党员吸纳的实践趋向	110
四、	农村党员吸纳的工作缺陷	118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员的训练教育	126
一、	农村党员思想行为的总体境况	127
二、	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地方规划	131
三、	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基本内容	136
四、	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实践模式	146
五、	农村党员训练教育的实际成效	152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寿阳县农村党组织的整顿实践	170
一、	农村党组织整顿的地方规划	171
二、	农村党组织整顿的实践运作	186
三、	农村党组织整顿的实际成效	219
结 语		231
主要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52

## 绪 论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sup>①</sup>，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由 1921 年建党时仅 50 多名党员的秘密组织，到如今已成为拥有 98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稚嫩到成熟，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既彰显了蓬勃旺盛的组织生命力，亦蕴结了由“简”至“巨”之历史演进逻辑。如何深入且生动细致地呈现中国共产党由“简”至“巨”的丰富历程及内涵，向来是研究者们所热切关注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论域，更是中共组织史研究者们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学术自觉和社会责任。早在 1942 年，毛泽东就曾告诫全党：“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sup>②</sup>因此，竭力探寻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足迹，既有助于全景式呈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组织发展之实态和历程，又有益于更深彻地体悟中国共产党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亦可为当下贯彻落实新时代组织路线提供历史的镜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 102 年，回望来路，细化研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0 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9 页。

究，可谓正逢其时。故本研究即为笔者忝列其间身体力行所作的一点努力。

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创建起来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要的依靠力量。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自有其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国 50 多名党员除个别外，大都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过痛苦抉择，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虽历经艰难险阻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在沿着这条革命道路行进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其社会构成与经典理论家的设想亦大不相同——工人党员并未占据绝对多数，而农民党员的人数在革命阶段不断增加。据统计，1927 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党人数为 57967 人，其中工人成分占 50.8%，农民成分占 18.7%；而到 1928 年六大时，全党党员 40000 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了 76.6%，工人党员仅占 10.9%；1929 年工人党员更下降到 7%；1930 年 9 月又降为 1.6%；直到 1949 年底，全国党员总数为 448.8 万人，其中工人党员占 12.24%，农民党员占 75.8%。<sup>①</sup>从中可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农民一直是党员队伍里的主体。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连续执政达 70 多年，据中组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 9804.1 万名，其中农牧渔民 2603.2 万名，约占 26.6%，虽然广泛意义上的农民党员比例较新中国成立之初已有大幅下降，但 490041 个行政村已建立党组织，其覆盖率已超过 99.9%。<sup>②</sup>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历程中极为注重其组织体系在农村社会的延伸与发展。新

<sup>①</sup> 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新世界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15 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党建研究》2023 年第 7 期。

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逐步开展各项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段,其时的组织工作至关重要,是组织建设的奠基阶段。随着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的互动日益直接、频繁和密切,农村的党员与党组织自然成为联结党和国家与农村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纽带,其地位和作用不容轻视。正因如此,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的研究成为中共组织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必然关注之焦点。

## 一、探究累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研究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勤耕不辍,硕果累累。“中共组织史,顾名思义,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党的组织路线保证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胜利实现的历史。”<sup>①</sup>中共组织史研究,即为党的组织建设史研究。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组织建设置于重要位置,因而吸引了学界持续且广泛之关注。就笔者目力所及,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中共组织史的关注大都局限在对党的领导人的相关文献及会议文件之解读,深入性的学理研究颇为罕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从中央到各省、市、县大量组织史资料的相继出版,以及一些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文稿等不断面世,中共组织史的研究有了更多史料支撑而得以渐次展开。然囿于资料的公开程度和意识形态,初期研究多依据党的会议、文件、重大事件等,聚焦于党的组织路线和组织建设的政策演变与发展进程,以宏观描述居多。此外,一些通论性的党史、国史著作也均有关涉。后来,随着乡村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渗透与影响,学界对农村党组织的关注度日渐增强,研究成果亦日益丰硕。在此,笔者仅就关涉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的研

<sup>①</sup>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序,第2页。

究成果作一大致梳理。

宏观的通论性的组织史或党史论作中，对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方针政策均略有概述。如，赵生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sup>①</sup>，肖东波和曹屯裕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研究》<sup>②</sup>，谢春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sup>③</sup>，张明楚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1921—2016）》<sup>④</sup>等。专门就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村党组织建设历程作了全面梳理的有卢先福、龚永爱主编的《农村基层党建历程》<sup>⑤</sup>一书，其中一章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党组织建设所面临的新的挑战、新的探索，组织整顿、组织建设的新要求等进行了概述。王先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sup>⑥</sup>就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农村在内的党的原有基层组织的整顿、新的基层组织的建立和新党员的发展等方面的“治党”活动进行了宏观描述。吕连仁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政策变化及影响分析》<sup>⑦</sup>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由限制发展甚至暂停发展的方针，后又改为大发展的方针这一组织发展的政策变化的原因、前后不同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及其对农村工作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分析，展现了其时党的基层组织基本实现了在乡、村两级全覆盖的历程及其对于夯实党的组织基础和进行农村社会整合所产生的重大作用。总而言之，上述通论性的宏观论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巩固和发展的政策或有所涉

---

①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9—251、280—284 页。

② 肖东波、曹屯裕：《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建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4—129 页。

③ 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党》，新世界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7—22 页。

④ 张明楚主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1921—2016）》，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0—195 页。

⑤ 卢先福、龚永爱主编：《农村基层党建历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0—200 页。

⑥ 王先俊：《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共党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⑦ 吕连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的政策变化及影响分析》，《理论探讨》2013 年第 3 期。

及,或进行专门梳理论述,但其中难见对整个过程的具体描摹及细致的分析解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主要是围绕建党与整党实践展开的,因而以此为主题的研究成果亦有很多。除了前述宏观论作多有涉及,以整党为主题的专题论文主要有李庆刚的《论建国初期的整党运动》<sup>①</sup>、赵亮的《1951—1954年整党运动研究》<sup>②</sup>、陈明艳的《1951—1954年中共整党研究》<sup>③</sup>等,其中对农村的建党或整党虽无专题论述,但就政策而言又多有关涉。而王锋德的《论建国初期农村整党》<sup>④</sup>、熊秋良的《“集体化”语境下农村整党考察(1952—1954)》<sup>⑤</sup>则专门就农村整党工作作了论述。前者侧重宏观性的整体概述,后者则主要利用《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就1952—1954年农村整党过程中的相关举措进行了描述,将其概括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引导,排斥富农党员、树立榜样、组织内清理整顿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由革命战争年代的秘密状况转变为完全的公开建党。东北作为最早对公开建党方式进行探索的地区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罗平汉、黄进华等着重描述了东北地区和黑龙江公开建党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影响。罗平汉的《东北地区“公开建党”进程分析》<sup>⑥</sup>通过描述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东北地区率先公开建党所经历的零星发展、大量发展和巩固发展三个阶段,客观呈现了东北地区率先公开建党所作的可贵探索。黄进华的《新中国成立前夕黑龙江地区“公开建党”探析》<sup>⑦</sup>对1948年前后黑龙江地区积极探索“公开建党”实践进行了概述,并就该地区突破党的“发展瓶颈”,积极建党所取得的成效及影响作了具

① 李庆刚:《论建国初期的整党运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8期。

② 赵亮:《1951—1954年整党运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2年。

③ 陈明艳:《1951—1954年中共整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年。

④ 王锋德:《论建国初期农村整党》,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6年。

⑤ 熊秋良:《“集体化”语境下农村整党考察(1952—1954)》,《福建论坛》2010年第11期。

⑥ 罗平汉:《东北地区“公开建党”进程分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5期。

⑦ 黄进华:《新中国成立前夕黑龙江地区“公开建党”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体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党工作总是与各项运动相伴而行，这种“运动式建党”是其时建党的重要模式。刘振华的《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建党方式》<sup>①</sup>则就“运动式建党”形成的原因及在实践中的成效作了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袭这一方式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但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主要任务的变化，仍然沿袭以政治运动方式建党显然会有许多“后遗症”。总体观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党建党实践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的组织建设逐步实现了“乡乡有支部”“村村有党员”的境况，对乡村社会政权重建影响极大。学者们从理论层面就“政党下乡”或“支部下乡”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与整合功能作了深入剖析。徐勇在《“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sup>②</sup>一文中提出，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而言，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在农村社会的延伸和发展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吕连仁的《建国初期“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sup>③</sup>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党支部下乡”运动，对基层党组织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从而推动了乡村社会政党化、政治化、组织化的进程进行了分析：“党政权力以党的组织网络为基础，重组了乡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和价值体系，实现了对农村空前的政治渗透和政治动员，把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农村一盘散沙的状况。”这种以政党权威进行的政治整合，对农村政治乃至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晓龙的《“支部下乡”：建国初期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sup>④</sup>也是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以鄂东 C 村为分

① 刘振华：《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建党方式》，《理论探讨》1999年第1期。

②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③ 吕连仁：《建国初期“党支部下乡”与农村政治整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④ 黄晓龙：《“支部下乡”：建国初期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析对象,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支部在C村的建立过程,以及建立后的党支部通过组织、动员、思想教育等方式对C村的整合过程,进而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支部下乡”对乡村社会整合的有效性。综观而言,上述论作主要的侧重点在于论述“政党下乡”或“支部下乡”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作用,对党组织的建设过程本身论述较少。

随着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相互交融和渗透,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史的研究论题所关注的视野不仅涉及宏大的历史评述、政策分析、社会影响,且更趋向于“由小而大”“自下而上”的区域性研究。何志明、满永、黄永源、杨丽梅、庆格勒图等分别就川北达县、安徽省、惠安县、川北、内蒙古等区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详细考论。杨丽梅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区整党建党运动研究》<sup>①</sup>和庆格勒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sup>②</sup>分别对川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整党建党进行了实证描述。何志明的《地权变动中的新区农村党建工作研究(1952—1954)——以川北达县为个案》<sup>③</sup>则利用档案等资料对土地改革结束后农村地权变动中新区农村党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及其实践进行了描述,认为新区农村党组织的建立为地权变动中的乡村社会顺利实现所有制转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满永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建党——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sup>④</sup>以20世纪50年代的安徽农村建党为中心,通过梳理中共中央建党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安徽的农村建党实践,讨论中共以建党“扎根”乡村的过程及其对乡村社会改造的影响。满永认为,农村建党

① 杨丽梅:《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北区整党建党运动研究》,《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

② 庆格勒图:《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③ 何志明:《地权变动中的新区农村党建工作研究(1952—1954)——以川北达县为个案》,《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④ 满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建党——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1期。

布局的完成既成了中共组织权力“扎根”乡村的标志，也颠覆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将其从相对自治状态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

此外，王奇生、李里峰、李秉奎等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的深入剖析，为深入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如，王奇生对 1927—1932 年广东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微观考察，描述了当时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及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的实态，从而揭示出“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sup>①</sup>。李里峰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以各级党内文件为基本资料，将关注重点从党组织的制度层面转向了实践运作层面，进而生动具体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李秉奎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研究区域，利用原始档案、地方志、报刊等史料，着力再现中共农村党组织建立、发展、巩固的历史图景，并粗略勾勒了根据地基层的党军、党政、党群关系，不仅关注党组织壮大的动力、基层党组织的运作，而且留意党组织的具体动员、党员的心态等，大大增强了历史事实的鲜活感和可信度。<sup>③</sup> 从这些学者的论作中可以体悟到他们不仅有微观的学术视野，而且有高远的学术追求，特别是有甘于枯坐档案馆、行走于乡间田野、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当然，正如王奇生先生所言：“这种地域性的考察结论对该时期中共历史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意义，尚有待更多地域性研究的累积和验证。”<sup>④</sup>可见，翔实生动的组织史面相急需更多力作以不断“验证”与丰富，故而深化中共组织史研究仍存

---

① 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 年）》，《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② 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④ 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 年）》，《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

有相当大的思考和拓展空间。

笔者所见难免挂一漏万,但通过上述梳理对研究之总体趋向有一概观。大体观之,学界对于中共组织史研究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组织的相关研究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如研究视角已由宏观综述趋向微观深描,由传统党史国史的实证见长转向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的交融互鉴,研究区域亦向“四面八方”不断延展开来。然既往研究关注党组织发展演变的概述性、通论性、重大事件的著作居多,而对党组织的时段性、地域性、结构性的研究仍显不足;对组织机构的沿革、组织制度的制定颁行论述较多,而对其组织机制的基层实际运作考察较少;对中共顶层、中层组织的结构和演变的总结多,而对基层党组织生态和形态的关注不够;对重要人物及上层党员群体关注多,而对普通党员群体乃至个体的研究阙如。如此,则很难精准地呈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组织发展演进的全貌及实态,也难以深切体味中共组织演进历程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生动景象,以及那些被淹没在“组织”中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党员、干部个体的各种境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综观当下的学术层累和组织建设实践,可拓展的研究空间仍很大——只见“组织”,不见“党员”,重视“上级组织”,忽略“基层支部”的研究局势仍需不断改善。为此,当下亟须在深入体悟和把握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择取新的研究视角,深入挖掘资料,进一步跟进相关研究,以期在现有的广度和宽度上增进研究的深度、厚度乃至温度。此亦为本研究价值所涉之一。

## 二、宏微互洽:中共组织史研究的一种实践趋向

承前所述,深化中共组织史研究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研究取向的抉择。目前,长时段、概述性、通论性的著述已对中共组织史研究的广度和宽度有所拓展,如果能进一步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厚度并略加温度,将能更深入地把握中共组织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若把长时段、概述

性、通论性的著述看作宏观性研究的话，那拓展研究的实践趋向就要深化微观性的分时段、分区域、分领域、分层级、分结构的研究，作为宏观性研究之补充。简言之，宏微互洽之多维观照，当为目下切实可行的研究取向。

论及微观性研究，得益于微观史学研究理路之极大启发。微观史学并非新近才出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它早已存在于历史研究中。微观史学大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至90年代达到鼎盛期。其主要特点是“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微观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sup>①</sup>学界关于微观史学的争论亦不绝于耳，然宏观与微观始终相互依存、如影随形是不争的事实。微观性研究取向的目标主要是通过微观分析来观照宏观问题，换言之，微观论述中凝结着宏观视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才是其真正的核心所在，因此，提及微观性研究绝非将微观与宏观完全割裂开来。

就中共组织发展的时段而言，人类历史处于永恒发展之中，一切历史事物都处于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若把中国共产党自身从年幼到成熟、从弱小到强大、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整个成长壮大历程视为一个历史长时段，其间则包含了几个成长的关键期，可把这些时段视为中时段或短时段，而对每一时段的研究均非常必要。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及至走进新时代，完成了近代以来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都与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自我革命”密切相关。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历

---

<sup>①</sup>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奋斗史”<sup>①</sup>。每一历史时段的奋斗所面临的社会生态和需要直面的时代命题各不相同,然而中共对于自身组织的建设和锤炼则始终未停息。因而,只有从特定历史时段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出发,细化对不同历史时段中共党组织状况的研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才能更全面深刻地体味中共组织发展的实态、发展历程中的各种境遇及其实践经验。当然,一定时段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一个点,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现时存在,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关节”,联结着上下百年。故而考察某一时段须从历史的绵延发展中纵向观照,切不可忽略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唯有如此,才可贴切地归结出隐伏于时间线条中的发展逻辑和历史规律。

就分布的区域和领域而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组织已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处处生根发芽。就分布的空间看,各地中共组织的社会地域特征突出,其历史条件、社会生态差别极大。若把全国空间范围内的中共组织分布视为一个大区域的话,包含在其间的省、区、城、县、乡、村则是不可或缺的“小区域”,特别是县以下的基础行政区划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其自然环境特质和历史文化生态则自成一体。由点及面、由面成体。可以说,一个县域乃至一个村庄里可能就藏着一个“中国”,其间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地方性知识有助于强化对全国整体情况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对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的理解,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学术思考的范围内。因此,对特定区域内党组织进行“解剖”可更直观地观察整个党组织在基层的发展状况。同理,亦可对城市、农村、国有企业、高校、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个领域的党组织“分而研之”,由一个点向“四面八方”辐射开来,真正做到“小题大做”,“小视域”中有“大境界”。

就组织体系和架构而言,中共组织有其特有的组织肌理、组织形

<sup>①</sup> 本刊评论员:《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求是》2018年第3期。

态和行为准则——既有上层的精心设计和推进，也离不开基层社会的建构与实践。其组织效能的获得既与设计者、领导者的政治视野、政治谋略、政治智慧相关，也与践行者的学识觉悟、责任担当、自我约束密切相关。因而，研究中不仅要关注上层的组织架构，更要关注下层的组织细部；既要关注组织制度的制定颁行，更要关注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实践；既要关注高层、中层领导干部，更要关注基层村级干部；既要关注党员群体，更要关注党员个体。通过分层级、分结构以关注“小问题”，进而了解“真情况”，抓住种种细节才能更细致真切地透视中共组织在发展历程中不断成长、完善的客观景象，进而深切体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锤炼出善于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勤于解决问题的“自我革命”之气度与胸怀的。

要言之，上述几方面并不截然孤立，实际研究中始终有各种交织重合。同时，微观性研究与宏观性研究在实践操作层面亦很难截然分野。一般而言，宏观性组织史论作大都气势恢宏，有全盘考虑与全局观念，能够站在较高基点梳理出组织发展演进及其推动社会革命历程的整体轮廓和基本史实。微观性组织史研究侧重对某一研究对象所蕴含的各种细节的探微与分析，如关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地域的党员之来源与分布、数量和质量、思想文化状况，基层组织的构成及运行等，然又不拘泥于某一细节，而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态和发展进程中去观察细节，又将细节置于中共组织发展的整体场景中。可以说，微观性组织史研究是就观察的视域进行一定收缩，基于中共组织发展的前后连续的进程，通过微观的审视与解构来洞彻宏观组织系统上下联动的运作历程和运作实态，有助于更清晰、更通透地看清描述对象的面相和本质。此外，微观论述的深描叙事亦使众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浮出“史”面，进而又可触及组织发展之温度。因而，对中共组织史任何整体上的理解与构建都是建立在对细节的关照和描述之上的。实事求是言之，微观性研究确是宏观性研究的有益且必要的补充。微观性组织史研究的主要宗旨是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主题，其意义